

January 2013

## The Primitive State of Antique Chinese Elenchus in Spoken and Written Style

Dalei H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Hu, Dalei. 2013. "The Primitive State of Antique Chinese Elenchus in Spoken and Written Styl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3, (1): pp.4-11.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1/21>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中国文体学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

##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Topic

吴承学

Wu Chengxue

据说,中国学术的国际化已成为趋势。但是,人文学科情况可能比较复杂,如果完全没有“本土化”的学术传统、背景与立场的话,“国际化”的结果极可能是全盘西化。近年来,中国文体学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相当关注的领域,这种现象可以视为学界对于本土传统文学理论的重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此特色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传统的文体学而产生的。所以,要把握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离不开对中国文体学的研究。开设“中国文体学研究”专栏就是为学术界探讨本土传统文学理论开辟一个讨论园地,栏目之所以称为“中国文体学研究”而不限定在古代,是希望它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能贯通古今,融合传统与现代。期待现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参加本栏目的讨论。

本专栏三篇论文皆属于传统文体学范围,但各有特色,或为宏观研究,或为个案研究。文学经典学是近年的学术热点,贾奋然教授《经典文体与文体的经典化》一文把文体学与经典学结合起来,提出文体经典化论题,这对于文体学与经典学研究或皆有所拓展。胡大雷教授《“口言”与“笔书”——论中古“难”体的原生态》一文不但还原了“难”体丰富复杂的原始语境,同时也呈现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古时期有“文笔之辨”,还应该有“言笔之辨”。此研究自出手眼,非仅释古而已。何诗海教授《〈古赋辨体〉与明代辨体批评》揭示了明代文体学风气和批评形式与元代一部辞赋总集的密切关系,前后勾连,便凸显了元明文体学之间某种内在关联的发展线索。

---

### “口言”与“笔书” ——论中古“难”体的原生态

胡大雷

**摘要:**从作家创作活动的“口言”、“笔书”来考察“难”体,可以得到“难”体原生态的基本情况,大致有三:其一,“难”体的语境、情景、场景包括:“论难”要敢于坚持己见、“论难”胜者能获赏赐、“论难”须求理论的本与逻辑的理、“论难”须有风度、“论难”须有“平议”或沟通、“答难”或为一家之言或“张数家之说”、“论难”须让对方“无以难之”、有时人们只欣赏“论难”本身而“不辨其理之所在”、“论难”主要凭口才等。其二,“难”自身具有的功能,如:或论辩、或责难诘问、或提出疑问疑难;而作家在运用“难”时又有其期望达到的功能,如:以“难”为测试、以“难”为调笑戏弄、设“难”以引发自己的解疑、设“难”以引发对方高见等。其三,“难”的内涵,有时则又能出现在“论”体、“赋”体、“箴”体、“牒”体、“策”体、“章句”体、“记”体、“设论”体、“表奏”体、“书”体、“倡优”体等文中;当“难”的内涵与“难”的外形式重合,这才是纯粹的“难”体;而“难”的内涵与“难”的外形式不重合,其文体探讨的意味更为广泛。

**关键词:** 难 “难”体 原生态

**作者简介:** 胡大雷, 文学博士,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主要从事中古文学研究。电子邮箱: hudalei\_1950@163.com 本文为“广西特聘专家”专项经费项目成果。

**Title:** The Primitive State of Antique Chinese Elenchus in Spoken and Written Style

**Abstract:** In antique Chinese writing, elenchus as a form of debate prose takes the form of spoken and written styles, and this paper takes this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primitive state of the genre.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ree main aspects of the genre of elenchus in the ancient China. The first concerns with the context, setting and scene of elenchus and there are some principles in the oral elenchus. The second concerns with the functions of elenchus. The third concerns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elenchus exhibited in the different styles of the genre. The genre of elenchus comes into being, the paper claims, whe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debate prose corresponds with the form of the debate prose. When the connotation and the form do not match, the stylistic features can open to more meaningful investigation.

**Key words:** elenchus debate prose primitive state

**Author:** Hu Dalei, Ph. D., is a professor of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with research focus o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hudalei\_1950@163.com

《文心雕龙·序志》对其“论文叙笔”的文体论, 设定论证理路: “原始以表末, 释名以章义, 选文以定篇, 敷理以举统”(刘勰 詹瑛 1924)。即推求各体的来源并阐述其流变, 解释各体的名称以显示其文体意义, 选取各体的文章以确定其范文, 陈述各体的写作理论而构成其文体论系统。我们在这里再探讨文体的撰作主体——作家在写作当场的活动状况。古来所谓“口出以为言, 笔书以为文”(王充 420), “难”体的产生, 有的是“口言”, 有的是“笔书”, 或口头, 或直接见诸文字, 或口头进而见诸文字。这些“口言”、“笔书”活动状况, 就是“难”体生成、发展的原生态状况; 经过这样的研究, 或许能够更清楚地弄通“难”体的功能等文体内涵。这就是本文的出发与落脚点。

## 一、“难”体的盛行

“难”体, 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纯粹的“难”, 只发难而不论证; 另一则是“论难”, 又“难”又“论”。“难”在汉魏晋已颇为盛行, 如史书记载, 贾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范晔 1240; vol. 36); 皇甫谧“所著诗赋诂论难甚多”(房玄龄 1418; vol. 51); 王接“杂论议、诗赋、碑颂、驳难十余万言”(房玄龄 1436; vol. 51)。“难”体文字, 有时会与其他文体的文字一起被收入到某种有命名的文集中, 如史书记载, 薛综“凡所著诗赋难论数万言, 名曰《私载》”

(陈寿 1254; vol. 53); 卢钦“所著诗赋论难数十篇, 名曰《小道》”(房玄龄 1255; vol. 44)。这些记载表明, “难”体在其个人撰著中占有相当的地位。“难”体盛行的另一标志是“难”体著作的出现, 如《汉书·艺文志》载录的有“难”性质的著作: “《董子》一篇。名无心, 难墨子”; “《虞丘说》一篇。难孙卿也”; “《秦零陵令信》一篇。难秦相李斯”; “《博士巨贤对》一篇。汉世, 难韩子、商君”(班固 1726; 1727; 1739; 1741; vol. 30)。又如《盐铁论》、《白虎通义》, 书中全以“难”展开。题目上标明为“难”者也有著作, 如史载李育“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范晔 2582; vol. 79)。又有“难”体的总集, 《隋书·经籍志四》著录有“《客难集》二十卷, 亡”(魏征 1086; vol. 35)。

中古各专门之学都有“难”体。如儒学“难”体, 何休“善历算, 与其师博士羊弼, 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 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范晔 2583; vol. 79)。《左氏膏肓》、《穀梁废疾》是“以难二传”的产品, 但不以“难”为名; 而李育的《难左氏义》却是以“难”为名的。有诸子“难”体, 如《韩非子》之数篇《难》, 王符《潜夫论》之《释难》, 这些“难”大都是针对现实问题的。又有玄学“难”体, 《三国志》注引何劭《王弼传》, 称王弼“注《易》, 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弼答其意”(陈寿 795—96; vol. 28)。王弼是以注《易》展开自己的玄学理论阐述的, 有人“难”, 王弼自然有“答”。又有佛学“难”体, 据僧佑《弘明集》,

或文中有“难”有“答”、或题目标明“难”者的佛教论著不少,如孙绰《喻道论》的“答难”,“或难曰:周孔适时而教,佛欲顿去之,将何以惩暴止奸,统理群生者哉? 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故在皇为皇,在王为王,佛者梵语,晋训‘觉’也……”(僧祐 17; vol. 3)。又如郑道子《神不灭论》有“难”有“答”。又有对方有论,己方难之,如:宗居士炳《答何承天书难白黑论》、《答何衡阳难释白黑论》,何承天《释〈均善难〉》,张融《门律》,周劭《难》,常侍朱昭之《难顾道士夷夏论》,高明二法师《答李交州森难佛不见形事》等。学术上的“论难”促进了文体的“难”的发达,“难”体为学术上的“论难”提供了恰当、合用的载体,二者相得益彰。

## 二、“难”体发生的语境、情景、场景

现在我们考察“难”的生成,即生成“难”体的原生态状况中那些语境、情景、场景等,这些在纯粹的“难”体文字中一般是不出现的。据《后汉书》载:

二十八年,大会百官,诏问谁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执金吾原鹿侯阴识可。博士张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为阴氏乎? 为天下乎? 即为阴氏,则阴侯可;为天下,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帝称善,曰:“欲置傅者,以辅太子也。今博士不难正朕,况太子乎?”(范曄 1251; vol. 37)

这是说“论难”要敢于坚持己见,不能“承望上意”;所谓“难正”,即以“难”来坚持正确的东西,不看在上位者的脸色。《后汉书》载:

[鲁]丕与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相难数事,帝善丕说,罢朝,特赐冠帻履袜衣一袭。丕因上疏曰:“[……]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范曄 884; vol. 25)

在朝廷上论难,皇帝欣赏者可有赏赐。而鲁丕谈及“论难于前”而获赏赐的原因在于有“师传”,更在于“明其据”与“立其义”。《世说新语》

亦称“难”之“依据”:“荀慈明与汝南袁闾相见,问颍川人士,慈明先及诸兄。闾笑曰:‘士但可因亲旧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难,依据者何经?’”(刘义庆 刘孝标 俞嘉锡 62—63)。《三国志》注引《轲别传》,则载管轲言“论难”的先后顺序:“夫论难当先审其本,然后求其理,理失则机谬,机谬则荣辱之主”(陈寿 824; vol. 29)。这是讲如何“论难”,首先要看理论的根本(本),其次追求逻辑(理),那么要点(机)就不会荒谬。《后汉书》载樊准讲汉孝明皇帝朝经学论难时名儒的风度:“故朝多皤皤之良,华首之老。每宴会,则论难衍衍,共求政化。详览群言,响如振玉”(范曄 1125; vol. 32)。衍衍,和乐貌也,这是理想的论难风度。

《后汉书》载:“诏书下太常:‘其详案注记,平议术之要,效验虚实。’太常就耽上选侍中韩说、博士蔡较、穀城门侯刘洪、右郎中陈调于太常府,复校注记,平议难问”(3041; 志 vol. 2)。在“难问”之间,有时是需要“平议”的,让大家一起来议论、评论;但“平议”有时有高人的公正评判,尤其是关于经学问题。如《晋书》载:

时秘书丞卫恒考正汲冢书,未讫而遭难。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证异义。时东莱太守陈留王庭坚难之,亦有证据。皙又释难,而庭坚已亡。散骑侍郎潘滔谓接曰:“卿才学理议,足解二子之纷,可试论之。”接遂详其得失。挚虞、谢衡皆博物多闻,咸以为允当。(房玄龄 1436; vol. 51)

卫恒、束皙考正汲冢书,王庭坚难之,束皙又释难,最后潘滔请王接“解二子之纷”,王接详细论说各自得失,这些博物多闻之士都觉得“允当”。

《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载: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诸儒皆伏其多通,著录千余人”(范曄 2581; vol. 79)。“答难”所持的观点,或为一家之言,或为“张数家之说”,是有一定的。

《三国志》注引《[费]祗别传》载:“孙权每别酌好酒以饮祗,视其已醉,然后问以国事,并论当世之务,辞难累至。祗辄辞以醉,退而撰次所问,事事条答,无所遗失”(陈寿 1061; vol. 44)。有

言语的“难”，应答为了不出差错，有时会先书写底稿。

以上主要是东汉儒学时代的“论难”，往往要有根据，要有对错，其中又有儒学理想化的“衍衍”风度等。而到魏晋玄学时代，虽然其“论难”也有与前代相同之处，但又有特殊的“意之所随”，以下述之。

《世说新语》载：“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195—96）。从这段王弼能向别人认为已达极致的“胜理”挑战，对之“作难”的记载，可见玄学的“论难”不同以往之处在于，他们是为“论难”而“论难”，未必要辩对错，所以有王弼“自为客主数番”，这也是说“论难”是要有回合的。又载：“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每相攻难。年馀后，但一两番，桓自叹才思转退。殷云：‘此乃是君转解’”（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43）。桓南郡只有一两番的交锋，所以“自叹才思转退”。又，《晋书》载：孙盛“博学，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房玄龄 2147；vol. 82）。又载，阮瞻“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房玄龄 1364；vol. 49）。这些都是说，要让对方“无以难之”或“物莫能难”，才算是“知名”。又，不能回答他人之“难”，自然是难堪的，《世说新语》载：“锺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195）。《晋书》也记载这样的故事：

尝有人著靴骑驴至兆门外，曰：“吾欲见刘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无称其字者，门人大怒。兆曰：“听前。”既进，踞床问兆曰：“闻君大学，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未云：“多有所疑。”客问之。兆说疑毕，客曰：“此易解耳。”因为辩释疑者是非耳。兆别更立意，客一难，兆不能对。（房玄龄 2350；vol. 91）

客有这样的本事，当然如此倨傲。有时因为

自己不能讲，又要参与“论难”，就以笔代谈，《世说新语》即载：“太叔广甚辩给，而挚仲治长于翰墨，俱为列卿。每至公坐，广谈，仲治不能对；退，著笔难广，广又不能答”（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55）。

即便有时是观点不同，经过沟通，互相理解对方之意，也就无所谓了，如《三国志》注引何劭《荀粲传》：荀粲“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骑驿，顷之，粲与嘏善”（陈寿 320；vol. 10）。“骑驿”，驿站的车马，此借指沟通之人。《世说新语》称荀粲、傅嘏“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199—200）。又，《晋书》载另一种“折中”式的沟通：“王坦之又尝著《公谦论》，袁宏作论以难之。伯览而美其辞旨，以为是非既辩，谁与正之，遂作《辩谦》以折中曰”（房玄龄 1993；vol. 75）。

因为是为“论难”而“论难”，所以要“设难”，即《世说新语》所载：“有北来道人好才理，与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讲《小品》。于时竺法深、孙兴公悉共听。此道人语，屡设疑难，林公辩答清析，辞气俱爽”（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18）。又载，于法开始与支道林争名，在支道林讲《小品》时故意为其“设难”，“因示语攻难数十番”，告知弟子哪些是“旧此中不可复通”（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29）。

本来，玄学对于人生人心来说，讲究对玄远超迈的体悟与欣赏，于是，当人们从论难中体悟到玄远超迈时，只赞赏“论难”之美而不需要去辩其理之所在。也只是在玄学时代，人们把“论难”仅仅当作过程来享受，如《世说新语》载：支道林、许询、谢安共集王濛家，辩论《庄子》的《渔父》篇。各人讲完，“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37）。《世说新语》又载一次相女婿的聚会上的“论难”：“羊孚弟娶王永言女，及王家见婿，孚送弟俱往。时永言父东阳尚在，殷仲堪是东阳女婿，亦在坐。孚雅善理义，乃与仲堪道《齐物》，殷难之。羊云：‘君四番后，当得见同。’殷笑曰：‘乃可得尽，何必相同。’乃至四番后一通。殷咨嗟曰：‘仆便无以相异。’叹为新拔者久之”（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41）。

人们把“论难”当做人生的某种欣赏,一有机会就设置这样的聚会“论难”。于是人们只欣赏“论难”这件事本身,而可以“不辩其理之所在”,即《世说新语》所载:“支(道林)为法师,许(掾)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27)。

“口言”的“论难”中,人们欣赏、赞叹的是口才,比如作《神灭论》的范缜,“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他就是口才很好,“既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唯与外弟萧琛相善,琛名曰‘口辩’,每服缜简诣”(姚思廉 664—70; vol. 48),“名曰‘口辩’”的萧琛都很赞叹其口才。也有学问不怎么样而口才好就“论难甚精”的情况,如《晋书》载:阮裕“虽不博学,论难甚精。尝问谢万云:‘未见《四本论》,君试为言之。’万叙说既毕,裕以傅嘏为长,于是构辞数百言,精义入微,闻者皆嗟味之”(房玄龄 1368; vol. 49)。还有明知其理不妥帖而“辞不能屈”的情况,《世说新语》载:

殷中军、孙安国、王、谢能言诸贤悉在,会稽王许殷与孙共论《易》象妙于见形。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会稽王慨然叹曰:“使真长来,故应有以制彼。”即迎真长,孙意已不如。真长既至,先令孙自叙本理,孙粗说己语,亦觉殊不及。向刘便作二百许语,辞难简切,孙理遂屈。一坐同时抚掌而笑,称美良久。(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38)

当真正在“辞难”上屈服对方,“论难”双方都“抚掌而笑,称美良久”,这即是对“论难”的享受。

上述所论,有的是诸子论难、经学论难的情况以及展示风度,有的是玄学论难、佛学论难,各不相同,还须仔细辨析。由于论难针对的对象不同,其论难的“原生态状况”也有一定的差异。如经学派别林立,因而强调所习经典之“家传师授”,诸生谨守“家法”,所谓“沉溺所习,玩守旧闻”,而不可“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其论难以排斥他说为要务,故很难在论难中有潇洒气派;经学儒生,又因其以释“先圣之积结”为习经目的,所以一般不会只欣赏论难本身而不辩其理之所在,他们的论难主要凭学问而非口才。诸子论难理所当然地

强调对自己学说的固守,而与佛教有关的论难,因涉及到“华夷之辨”等关乎佛教存在合理性之诘难的大是大非的沉重论题,论难双方亦不可能“不辩其理”。应该说,和其他论难相比,玄学论难最为轻松、活泼、愉快、潇洒。玄学论难以思辨为特色,因思辨所具的辩证因素,其“理”往往似冤而亲,所以,论难双方无需——事实上也难以就论题争论出个结果来。结果是次要的,对论难过程——展示才华的过程——的享受才是最重要的,这也许是玄学论难令人痴迷的魅力所在。

### 三、“难”的各种功能

“难”这种行为动作之所以发生,在作家来说是有目的性的,这就是作家所期望的“难”的功能。是否能实现“难”的目的性功能,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此处先来探讨“难”这种行为动作本身就具有的目的性功能。

其一,论辩。《三国志》记载关于曹氏出于何族的讨论、争辩,有所谓“[蒋]济难[高堂]隆,及与尚书缪袭往反,并有理据”以及“[蒋]济又难”云云(陈寿 456; vol. 14)。此中蒋济两次的“难”,即诘问、辩难、质询。《后汉书》所载亦是:“帝即召上殿,令与诸儒难说,[戴]凭多所解释。[……]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戴]凭遂重五十餘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范晔 2552—53; vol. 79)。又有所谓“难驳”,指诘难批驳的文章。《晋书》称华峤有“所著论议难驳诗赋之属数十万言”(房玄龄 1264—65; vol. 44)。又,《三国志》载:“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孙]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陈寿 1429—30; vol. 64)。论辩就要看谁能折服对方,此即“难折”,《世说新语》载:“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 201)。“难折”甚至以诛杀相威胁。如《后汉书》载:“诏下其议,[袁]安又与[窦]宪更相难折。宪险急负势,言辞骄讦,至诋毁安,称光武诛韩歆、戴

涉故事,安终不移”(范晔 1521;vol. 45)。

其二,责难、诘问。这是不需要回答的,如杨伯峻注《孟子·离娄下》“于禽兽又何难焉”,写道:“难,责难之意”(杨伯峻 198)。又如《三国志》载:诸葛恪“意欲曜威淮南,驱略民人,而诸将或难之曰:‘今引军深入,疆场之民,必相率远遁,恐兵劳而功少,不如止围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图之,乃可大获。’恪从其计,回军还围新城”(陈寿 1438;vol. 64)。

其三,疑问、疑难及其提出。《墨子·小取》:“若若是,则虽盗人,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人,非杀人也,无难”(《墨子》134)。“无难”即没有疑问。《三国志》注引《辂别传》曰:“[王经]欲使辂卜,而有疑难之言,辂笑而咎之曰:‘君侯州里达人,何言之鄙! [……]苟道之明,圣贤不让,况吾小人,敢以为难!’”(陈寿 815;vol. 29)。“疑难之言”即疑问之言,“敢以为难”即岂敢用有疑问之言。用为动词,就是有疑而问,如《史记·夏本纪》:“禹拜曰:‘於,予何言! 予思日孳孳。’皋陶难禹曰:‘何谓孳孳?’”(司马迁 79;vol. 2)。皋陶的“难”,只是有疑而问。所谓“难疑”,犹质疑。《史记》载,战国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司马迁 2447;vol. 81),赵奢诘问不倒赵括;《后汉书》载,邓皇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范晔 418;vol. 10),即提出疑问、请教。汉王充《论衡》有“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135)。“难问”,就疑难问题相问。又如有人对华佗同一种病用不同的药有所疑问,即“或难其异”(陈寿 800;vol. 29)。

以上是“难”这种行为动作本身就具有的功能,以下探讨“难”这种行为动作本身虽不见得具有某种功能,但人们运用“难”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实现的功能。

其一,测试。东汉徐防上疏曰:“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范晔 1501;vol. 44)。徐防“开五十难”就是用于“博士及甲乙策试”。又,后秦苻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房玄龄 2888;vol. 113)。

其二,调笑乃至戏弄。《三国志》载:“[费]祗为昭信校尉使吴。孙权性既滑稽,嘲调无方,诸葛恪、羊衢等才博果辩,论难锋至,祗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陈寿 1060—61;vol. 44)。孙权让诸葛恪、羊衢等“论难锋至”,就是想调笑乃至戏弄费祗,此从下文可见,《三国志》注引《江表传》载:“费祗聘于吴, [……]酒酣,祗与诸葛恪相对嘲难,言及吴、蜀。祗问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浊,无水者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祗复问:‘吴字云何?’恪曰:‘无口者天,有口者吴,下临沧海,天子帝都’”(陈寿 1251;vol. 53)。又如《三国志》载:“[孙皓]又于酒后使侍臣难折公卿,以嘲弄侵克,发摘私短以为欢”(陈寿 1462;vol. 65)。又,隋人侯白《启颜录》有“论难”篇,可见人们把某种“论难”当作笑话看。

其三,设客“难”己,以引发自己以解疑表达思想感情。如东方朔《答客难》,假设有客“难”己以引发自己的意见。晋皇甫谧“遂究宾主之论,以解难者,名曰《释劝》”(房玄龄 1422;vol. 51)。又有局部上的“设客难己”,如汉时贾让奏文中载有“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 [……] 难者将曰:‘河水高于平地,岁增堤防,犹尚决溢,不可以开渠’”(班固 1694—95;vol. 29)。这里有两个“难者将曰”,是贾让预设的责难、诘问会是什么,有了这预设的“难”,就利于自己回答了。又,《晋书》载江统作《徙戎论》,“其辞曰”的文中有“难者曰”云云(房玄龄 1529—34;vol. 56),《晋书》载范宁又“陈时政曰”,文中亦有“难者必曰”云云(房玄龄 1986;vol. 75),都是设客难己。

其四,“难”又有引发对方发表高见的作用。如《晋书》载,向秀与嵇康讨论“养生”而“辞难往复”,“盖欲发康高致也”,是为了让嵇康的高见有机会表达出来,因为嵇康这个人往往不愿意自己去表达某种看法。向秀将注《庄子》,嵇康曰:“此书诂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房玄龄 1374;vol. 49)。

#### 四、“难”的内形式与外形式

或提出问题以发“难”,或回答问题以发“难”,总之,在文体中表现为以自己的话语“难”住了对方,这是作为“难”这种文体的内涵,也可

以说这是“难”的内形式。“难”的内涵的表达形式,或注明是“难”体,如《韩非子》的《难》,或《答客难》之类,这是纯粹的“难”,世人所述多矣。但“难”的这种内涵,又往往以其他文体来表达,或者说,“难”主要构成“难”体,但又能出现在其他多种文体中,这完全要看作者的主观目的,这是此处关注的重点。

其一,“论难”体。“论难”往往连称,如《汉书》载朱云“既论难,连拄五鹿君”(班固 2913; vol. 67);又如《晋书》载虞喜“专心经传,兼览讖纬,乃著《安天论》以难浑、盖”(房玄龄 2349; vol. 91)。又有成著作形式的“论”体,如入《隋书·经籍志》子部的《盐铁论》,入《隋书·经籍志》经部的《白虎通义》等。

其二,“赋”体。《史记》载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的情况:“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司马迁 3002; vol. 117)。“为齐难”,即为齐国责难、诘问,所发出的言语即“难”体,涵括在赋中。

其三,“箴”体。《汉书》载“扬雄作《酒箴》以讽谏成帝,其文为酒客难法度士”(班固 3712; vol. 92)。“难法度士”,当是“难”体的格式,但全文不可见,只有节录,又题名为“酒箴”,往往被忽略了“难”体的性质。

其四,“牒”体。《后汉书》载:“[马]援还,从公府求得前奏,难十余条,乃随牒解释,更具表言”(范晔 837; vol. 24)。

其五,“策”体。《史记》载以“难”为“策”:“[公孙]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司马迁 2950; vol. 112)。

其六,“章句”体。《后汉书》载:曹充持《庆氏礼》,“作章句辩难,于是遂有庆氏学”(范晔 1201; vol. 35)。

其七,“记”体。《后汉书》载:“[袁京]习《孟氏易》,作《难记》三十万言”(范晔 1522; vol. 45)。又载:“[张奂]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范晔 2142; vol. 65)。又载郑众作《春秋难记条例》(范晔 1224; vol. 36)。

其八,“设论”体。《后汉书》载:“[蔡邕]感东方朔《客难》及杨雄、班固、崔骃之徒设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黜其是而矫其非,作《释海》以戒

厉云尔”(范晔 1980; vol. 60)。《文选》有“设论”体,蔡邕所说的文辞都在此中。《后汉书》又载:侯瑾“以莫知于世,故作《应宾难》以自寄”(范晔 2649; vol. 80);《晋书》载,束皙“性沈退,不慕荣利,作《玄居释》以拟《客难》”(房玄龄 1428; vol. 51)。

其九,“表奏”体。《三国志》载“[孙]琳所表奏,多见难问”(陈寿 1153; vol. 48)。

其十,“书”体。《后汉书》载:“[班昭]作《女诫》七篇,有助内训。[……]马融善之,令妻女习焉。昭女妹曹丰生,亦有才惠,为书以难之,辞有可观”(范晔 2786—92; vol. 84)。《三国志》注引何劭《王弼传》:“[王]弼注《易》,颍川人荀融难弼大衍义。弼答其意,白书以戏之曰”(陈寿 795—96; vol. 28)。王弼答其“难”是用书信体。《三国志》载:“[滕]胤自以祸及,因留融、晏,勒兵自卫,召典军杨崇、将军孙资,告以[孙]琳为乱,迫融等使有书难琳”(陈寿 1446; vol. 64)。以“书”的形式论难佛理在晋时很盛行,如《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有《郗与开法师书》,《高僧传》之《于法开传》云:“后移白山灵鹫寺,每与支道林争即色空义,庐江何默申明开难,高平郗超宣述林解,并传于世”(慧皎 168; vol. 4)。

其十一,“难”与倡优戏剧。《三国志》载:

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许]慈、[胡]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值庶事草创,动多疑议,慈、潜更相克伐,谤讟忿争,形于声色;书籍有无,不相通借,时寻楚诤,以相震撼。其矜己妒彼,乃至于此。先主愍其若斯,群僚大会,使倡家假为二子之容。效其讼阍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初以辞义相难,终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陈寿 1023; vol. 42)

当论难之时出现意气之争以至于“时寻楚诤,以相震撼”这种严重后果时,调解者以戏剧形式揭露其弊,这是一种以“刀仗相屈”使之极端化而感化论难双方的特殊应对策略。但我们也看到,现实生活中的“论难”如何被艺术汲取而成为戏剧矛盾的。

因为诸文体的功能、目的、用途等不一样,“难”在上述诸文体中的表达、叙写方式也就可能不一样,并不能简单认为就是命名不同而已。



“难”在生成时,有着“口言”与“笔书”的不同情况,其实际语境、情景、场景,再加上实际产生的“难”体文字,就应该是“难”体的原生态状况。这种语境、情景、场景,又含有“难”体文字的实际功能及其文体呈现,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难”体文字,一般是删略去这些极有意味的语境、情景、场景的;没有了这些语境、情景、场景,对文体的理论阐述,毕竟是一种缺憾,对文体的理解也是不完整的。因此,这里提出研究文体应该探讨文体的原生态生存状况,应该探讨文体生存的那些语境、情景、场景,应该探讨作家的整个活动情况,如此则我们对文体必定会有更深入、广泛的认识。因此,文体探讨不应仅仅只局限于其文本形式的探讨,把其置于作家活动的过程与结果中来考察,会得到更有意味的东西。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班固:《汉书》。100卷。北京:中华书局,  
[Ban, Gu. *The Book of the Han - Dynasty*. 100 Vol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2. ]
- 陈寿:《三国志》。6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Chen, Shou. *The Chronicles of the Three Kingdoms*. 65 Vol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
- 范曄:《后汉书》。90卷,志30卷。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Fan, Ye. *The Book of the Late Han - Dynasty*. 90 Vols. Annals, 30 Vol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 ]
- 房玄龄:《晋书》。130卷。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Fang, Xuanling. *The Book of the Jin Dynasty*. 130 Vol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 ]
- 慧皎:《高僧传》(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Huijiao.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 Vol. 4.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2. ]

- 刘勰 詹鍈:《文心雕龙义证》。1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Liu, Xie, and Zhan Ying. *Verifi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10 Vol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 刘义庆 刘孝标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Liu, Yiqing, et al.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3 Vol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3. ]
- 《墨子》:《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Mo, Di. *Motzu (First Corpus of Collected Classics editio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
- 僧祐:《弘明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Sengyou. *Essays on Promoting Civilization*. Vol. 3.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1. ]
- 司马迁:《史记》。13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Sima, Qia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130 Vol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
- 王充:《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Wang, Chong. *Lun Heng: Critical Essay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4. ]
- 魏征:《隋书》。85卷。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Wei, Zheng. *The Book of the Sui Dynasty*. 85 Vol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3. ]
- 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Yang, Bojun. *Mencius Modern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
- 姚思廉:《梁书》(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Yao, Silian. *The Book of the Liang Dynasty*. Vol. 48.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3. ]

(责任编辑:查正贤)

